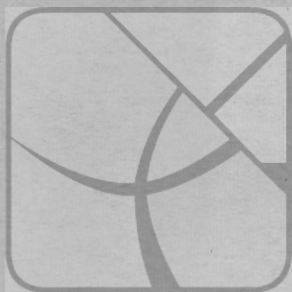




港內雜話

長屋出版社出版

陳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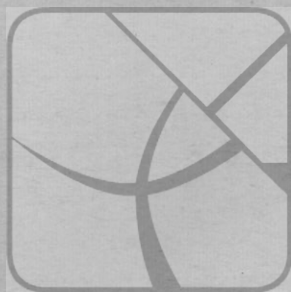


洪天賜教授捐贈

海島叢書之四

港內雜話

陳之著



Ang Tian Se
Jabatan Perguru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長屋出版社出版

目 錄

多元万岁	(1)
也谈爱国	(3)
没有祖国的人	(5)
「自卫意识」	(7)
贼性与贼性的社会	(9)
无意间涌起的感念	(11)
陈腔烂调	(13)
不算是批评	(15)
广告和批评	(17)
从「孟母教子」想起	(19)
生存问题	(21)
被送去的事	(23)
谈良心	(25)
好人难做	(27)
不算是怒	(29)
有和无	(31)
失去了价值的人	(33)
谈控诉	(35)
地狱里的「开明」	(37)
「危险」之谈	(39)
「在下」的敬意	(41)
清洁的后面	(43)
「在手术台上」的大学生	(45)

这
多感
段用
此目
魯
光荣
己如
我
然我
嫌疑
的社
性吧
民性
譬
有上
有举
等对
的。
文

多元萬歲

(1)
(3)
(5)
(7)
(9)
(11) 近来再看些鲁迅的杂文，看了这些杂文，脑子里却总有许多感触，我想，重看鲁迅杂文并不会被人怀疑是要学鲁迅的手段用文章去攻杀文棍们——然而，这又未尝不可，可我并不抱此目的，无需多提。

(13) 鲁迅是愤恨自己的民族有许多弱点，而这些弱点却又被人光荣起来，因此，阿Q精神形成幻想的伟大，沾沾自喜夸耀自己如何了不起，这伟大的国民性是鲁迅所最了解的。

(17) 我们今天来看自己，也许我们的确不配做中国的国民，当然我们不敢自称是中国的国民了，谈得多了，还有沙文主义的嫌疑，因此我们不是鲁迅所指的国民；我们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这里的国民性可就不完全统一，或者可称多元国民性吧。或也包括无国籍的民性在内。要如鲁迅般指出这里的国民性并不容易，但也不是太难。

(31) 譬如迷信吧，却是统一的，虽然形式或有不同，有阿拉、
(35) 有上帝、有神、有菩萨，这是多元迷信，有大锣小鼓的遊神，
(37) 有举火把的圣会，有牛车的遊行……，一概被一视同仁，平
(39) 等对待，在多元社会中生存、发展。那古老的迷信是很可爱的。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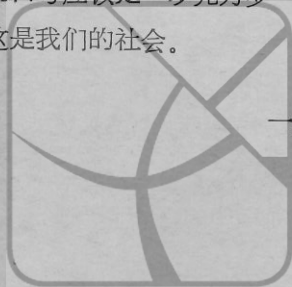
(45) 文坛上也是多元的，各有不同文字的文艺，但就马华文艺

本身，或也有多元的派别，有现实主义，有现代主义，有革命主义，或也有“爱国主义”，当中也应有非现实，非现代，非革命，非爱国的吧，但并不成一派，或应是青苔派，只会附生。这派别当中各有所宗，当然也有如鲁迅所指的假革命什么激进派和附和高官贵人的所谓“鹰犬”文人，可怜，前马来亚历史被这些文人写得莫名其妙。

也许正是因为多元，连我们用的钞票也多元化了，有至少三个地区的呢；当然，无国籍者也属其中一元，这多元是多姿多彩的。

我想，我们今天的口号应该是“多元万岁”！

“多元万岁！”这是我们的社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

是无
去一
命也
孩
们，有
拼活地
谈爱国
生的人
方的一
发成的
只能看
百五十
一一大
回
十一年
大清帝
大明，
敦祖家

也談愛國

最近看了一些文章，说来说去都是谈爱国。当然，谈爱国是无罪的，我从来只想着如何生活，甚且也想着应如何生存下去——幸好没有象宋人那么高兴觉得死也是美的一一留着条活命也跟人家谈爱国。

孩子们不懂事，但会天真地说要爱国，至于成年的先生们，有些也大谈爱国（他们似乎都很爱国），而绝大部分的拼死拼活地流汗苦干，胼手胝足地挣扎着生活的人，口中却不喜欢谈爱国，而这国家的财富，繁荣与进步，却又都是这些劳碌终生的人群的血汗所换来的，莱佛士当年也并不会不知道，这地方的一切进步都是那些奴隶们（我们的祖先，悲哀！）万手开发成的，可是史册上却是莱佛士一手的功劳，当然，我们今天只能看到莱佛士傲视着路过他脚下的车辆，而那些奴隶们在一百五十一年后的今天连尸骨也无着落了，莱佛士自然是爱国——大不列颠帝国。

回过来说我们的祖先吧，（光荣的奴隶祖先，带来一百五十一年前的今天），他们可就不知道爱什么国，爱大明帝国？爱大清帝国？抑是爱大中华民国？也许都爱过，有的子孙今天连大明，大清，当然连大民国都不认识了，先前还有不少爱“伦敦祖家”的（伦敦并不是国，可就不知为什么也当国来爱）。

今天有“国”了，文人便常常会口沫横飞地大谈爱国了，因此，从所谓“孟迪卡”到“独立”，那爱国口号是很响亮的，照说，爱国运动是首要问题，清洁运动有了，灭蚊运动有了，还有许多的形形色色的运动也有了，唯独没有爱国运动，这应该是“爱国主义”的先生举臂高呼的时候，尽写几篇文章是无补于事的。

那些不知有“国”的无国籍者此时也真不知道有没有爱国的资格？（可怜，是奴隶祖先的子孙），尽管如此，爱国是要的，想来，无国籍者或应自立一个“无国籍共和国”，这样，也就有国可爱了，而且可以成为“无国籍共和国良好公民”！如此，如此。



一九七〇年一月

有国
在他
中中

籍，
们切
题。

便提
问了
钱（
二万

是公
好几

“他
这些
了，那

沒有祖國的人

任何人如果生活在別的国家而被人称为侨民，这意味他是有国籍的，不管他是华侨、美侨、印侨（印尼、印度）也好，在他的侨民身份的后面有一个祖国，华侨可以堂堂皇皇地称为中国人，因为他有一个祖国。

尽管这些侨民不是外国的公民，可是他们也还有一个国籍，甚至以色列人也有祖国。吉隆坡当局经常在警告和提醒人们切勿提起所谓敏感性的问题，公民权问题也算是敏感性的问题。农历新年期间，在电视机里出现“声宝之夜”的节目里，便提到了这敏感性的问题，“声宝之夜”的一项问答节目里，问了一个很富刺激性的问题——要申请为星加坡公民需要多少钱（大意），回答这问题的那位姑娘，毫不迟疑地答要有“十二万五千元”。

这样的题目可真容易提醒人，尤其是那些既不是侨民又不是公民的无国籍者，被此一提，可谓悲从中来，我亲耳就听到好几声“他妈的”，这自然是发自那些无国籍者的口中了，这“他妈的”听来是有几分怒气，可就不知它渗进了多少哀愁。这些没有祖国的人，终日也只能“他妈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那议论还在议论。

“漏曼莉漏托”（No money no talk），这句“普

“通英语”语法自然不通，可人人皆晓，因此，有不少人在自嘲地唱“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了，这现实的现实，是无以辩驳的！父亲的父亲，坟墓还在碧山亭、海南山，当然那长堤，那钟楼，那铜象，都还是祖父那辈人万手造成的，可今天，仍旧还是没有着落的今天，也只落得一个“无国籍”的名堂，非公民也还不算太坏，可是非公民者有些却有祖国。

自然，在钱银和税钱方面，倒是一律平等，这是无可非议的，无国籍者是不会反对香烟增价，反对清洁运动的。几时，他们才有祖国，问上帝？问阿拉？还是问菩萨？不要叫“阿门”。



一九七〇年二月

我
海光的
的文人，
曹聚仁
之喻意，
“我行我
撇开
我的理解
一部小说
她的自信
卫能力仍
而走上自
命。
这么
个鬼多于
常会“冷
不防”之
防”，可
三十

「自衛意識」

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到“自卫意识”这种词意，记得殷海光的作品中，曾提到李敖指他的自卫意识不强，这两位台湾的文人，在台湾文坛上是有许多风浪的，殷海光得恶疾而死，曹聚仁评之为“不识时务”，以致咎由自取，这或有自取灭亡之喻意，李敖仍旧摇着他的“全盘接受西化”的旗帜，在台湾“我行我素”。

撇开殷海光和李敖不提，现在来谈谈这“自卫意识”，以我的理解，这“自卫意识”是指思想上的警惕性，阮朗在他的一部小说《她还活着》里曾谈到李婷的死，提到李婷的父亲对她的自信，认为她有自卫能力抗拒香港社会的黑暗，这里的自卫能力仍旧是思想上的警惕性，李婷终于抗拒不了环境的压迫而走上自杀的道路，李婷的父亲也以自杀来了结自己残老的生命。

这么说，所谓“自卫意识”是思想上的守卫。我想，在这个鬼多于人的世界里，我们的确要有一种自卫的本能，因为经常会“冷不防”，这“冷不防”将会有何结果，就只有在“冷不防”之后才会体验到这恶果的滋味。我们之所以会“冷不防”，可以说是麻痹大意，也即是缺乏警惕性。

三十年以前，鲁迅的门下闯来了一位青年，这青年叫王方

仁，寄食于鲁迅处，鲁迅不疑有他，和柔石联同这位王方仁一同搞了个“朝花社”，王方仁后来不仅暗中吞没了资金，吞没了代售“朝花社”的书款，抹了屁股便溜回宁波乡下买田、修祠堂、造族谱去了。去年十二月间有人在香港揭露了这位叫王方仁的家伙，所谓王方仁者即是“忘恩负义，卖师卖友，吞财骗款”的梅川，据说这王方仁（即梅川）最近在香港台派报章上挂起鲁迅“弟子”的招牌在“行骗，造谣，诋毁革命，因而取得了反共小卒的地位，为台湾的政治僵尸吹打叫嚣，尽着它的送丧的任务。”从这位文坛上“假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看来，鲁迅和柔石是忽略了一点，也就是放松了“自卫意识”，而致被王方仁（即梅川）乘了机。

且说，“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智广中失意文人的话，今天用在我们的社会，还是行得通。

当然，怀疑主义是很普遍的，今天，若不常常想到“自卫”，是很可能在“冷不防”中触礁，我想不少人在恍然大悟之后会有此经验。那么，我们的思想在这复杂环境里，就得会守，因为不守，就会被“冷不防”或逐步的进攻，等到恍然大悟时，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一九七〇年二月

我
婚女婿
意，放
一点贼
这
我终
和未婚
的人，
避孕袋
的青年
社
言下之
我
出星岛
条，（
如此，
时期有
我
试常常

賊性與賊性的社會

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片名可忘了。其中有一节是未婚女婿到岳父的办公室里，做岳父的正忙着在电话里交涉生意，放下电话之后，他对着未婚女婿说：“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点贼性。”

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冲击着，我反复思味、观察、体验，我终于发现了这句话的作用，影片中的未婚女婿，早就背地里和未婚妻鬼混，做岳父岳母的，一直以为未婚女婿不是有贼性的人，因此，女儿婚前无事，便引以为荣，最终因为女的没带避孕袋，未婚女婿便兴味索然，一走了之，这时，这满身贼性的青年，便成了“要有贼性”这句话的真正的化身了。

社会上常流行一句话，“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言下之意，人不可老老实实在地生活，否则便永远是穷光蛋。

我想这道理是有其实践作用的，听说日军惨败而投降，撤出星岛之后，有人这边封那边封，贴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的封条，（这里不是指当时的民间组织），有人捞到了鸦片，如此，如此，便成了大发富，正所谓一夜之间便发起来了，这是乱世时期有人发大财，然而，就在我们的今天又如何？

我看不必只从发财这方面来谈，从小学生读书，测验或考试常常要作弊这点来看，许多人都当过学生，对作弊这一行为

是有所认识的，这便是贼性；那些明目张胆地大抢特抢的贼，已经名符其实称为贼了，至于平常所见，许许多多见怪不怪的事，谓之具有贼性是不为过的。

什么是贼性，这里面含有偷、抢、骗的内容，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会偷，会抢，会骗，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事实在证明不偷，不抢，不骗是很难成事的，这不是单纯一个社会问题，国际舞台上政治斗法不也有着这丰富的内容吗？

有不少人，不偷，不抢，不骗是不能立足的，换句话说，不发挥这贼性的手段，他就要垮台。贼性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意识，如果是一个有偷、有抢、有骗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贼性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家是拿不出孔子之道来救世的，也拿不出耶苏之教来救人，我们就生活在贼性的世界里，觉得奇怪吗？

一九七〇年三月

前些
刊，是一
一大篇一
无味。

在学校
耐心，总
来，倒觉得
角尖的“勤
充塞着这些

许多从
着那些老学
这些文章时
里打转，并
行。

假如是
以自己的学
东西来研究
这倒是很可

我在翻

無意間湧起的感念

前些时候在书店里偶然翻到一本由南大中文系印编的会刊，是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印刷也还算简便。翻看那些文章，一大篇一大篇都是些抄抄录录的考据，引证的材料，看了索然无味。

在学校时我就曾搞过这种所谓“学术研究”，也许是没有耐心，总不愿从古书堆中抄抄录录，也不喜欢画框框，现在想来，倒觉得很庆幸。那种刻板的学术研究，成了今天许多钻牛角尖的“勤学生”的死胡同。翻开一些学校毕业特刊，也仍旧充塞着这些“长篇大录”的“学术研究”的文章。

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不知打从什么时候起就跟着那些老学究走上这条路。那些荀子、孟子、文字学什么的，在写这些文章时，抄录的几乎比自己写的还要多，而且总在那死框框里打转，并不见有什么创新，这种“学旧”工夫，目前很是流行。

假如是为了整理文史资料，抄抄录录是非做不可，但若是以自己的学识来写文章，而一味从古书堆中找那些生青苔了的东西来研究，那不仅浪费精力，对所谓学术成就也无补于事，这倒是很可怜的。

我在翻阅那本中文学会会刊的同时，发现了那些喜欢创作

的人却没有婆婆妈妈的考论、引证、抄典等文章出现，或许正是这些喜欢创作的人就只顾创作，而不愿象“老鼠鱼”那样啃青苔。

在会刊的后部分，大半是词，也有些新诗和散文。那些词填得很莫名其妙，总之只要那字眼用得上，就管不着节令、环境、事物是否切合实际，这又是一种死方法，还是凑兴之作？有几首，倒还文雅。

翻阅间，我脑海里浮现了好些熟悉的脸孔，一种亲切的怀旧之情涌上心头，那其间的作者多半都是所谓“同窗”会舞文弄墨的，在南大来说目前算是最多文才的一班。班上有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戏剧的。（会刊里我却找不到另外的几个“同窗”。）那些写了几篇考考证证的，可能从此只捧着书本教学生抄抄录录了。

至于那些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戏剧的，可就不甘于寂寞，那个“第三个希望”的作者死得太早，他或也是不甘寂寞中的一个，会刊里他也填上了“不止于第三”的“希望”。

目前，各分东西，天涯海角，亦不知栖落何处。前些时还听到散文的风铃声，响自麻河的岸角，拉让江的小说家，或只用口在说故事了，写诗的，还只留下云南园几片憔悴的怀念，几痕抹不去的伤疤。

我宁愿读一首真情流露的诗，却不愿看那些缠脚布般的抄录傑作，无意间，写下了这一则散乱的感念。

一九七〇年三月

有人在
结论不外什

看了这
的论调，此
道德家”所
盘倒了出来
能在人生中

看了这
萌短见，许
海。最近看
其目标竟是
扬。

不幸得
必然能成功
来了妒忌，有
才”，此又是

我想，这
“空头”，因
纪人”的咀脸

陳腔爛調

有人在谈自知和无知的道理，这些自知和无知的道理，其结论不外什么是成功，什么才不成功。

看了这些似论似理的文章，使我想起了那些“致富之道”的论调，此时此地，我们仍旧看到“道德家”之言，这些“道德家”所给我们的指导，往往根据一种过时的价值观念，全盘倒了出来，照这些作家或文人之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便能在人生中得到成功和快乐。

看了这些“成功”之论调，我想不少“不成功者”都会自萌短见，许多“无知”或“自知”者，跳楼的跳楼，跳海的跳海。最近看了一位自叹坎坷的作家，发表了一些惊人的伟论，其目标竟是人活着不外争名争利，此价值观念，仍被大事宣扬。

不幸得很，这些强调个人至上的理论，并不是“自知”和必然能成功的理论，虽则有人“自知”已成了作家，由此还引来了妒忌，有一位先生还加以告慰说“有人妒，才证明自己有才”，此又是“自知”之言。

我想，这社会一直就在叫人如何自私地生存为利，学会找“空头”，因此遇着人，一开口就“有什么空头”，犹如“经纪人”的咀脸。当然，这可苦了中学生，为了一张文憑，常常

成了“短命鬼”、或为了不值得爱的爱而自杀，做父母的永远不了解自己，一种沉痛和负罪的怨恨，总在上一代人心中隐藏，然而，这可诅咒的社会却在“自知”之文人中不敢多提一字，他们只会以先知先觉的狭小的个人主义的主观论点，去叫人成功，叫人求名求利。

这时代给予我们太多的愤怒，我们今天不在寻求你和我这种单纯的个人利益的目标，而是在寻求那完整的群体利益的目标。充斥于我们眼前的，却是这些迂腐的过剩的陈腔滥调，让无知者以为他们有知，而要爬上“成功之路”，这是可悲的。但可怜的是，这些挂“现实主义”之名的文人，不过是这些陈腐发臭的理論的生产者，当我们的青年有朝一日把他们一个个拉下来的时候，那可怜相就更好看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

一个。
评的地方。
如果
是有所要
然而，
散播给读者
思想强音。
取新的思想
勇猛的反扑
忡忡，他们
青年人以愤
既是今
过剩”的同
至几千年前
同归，志即
腐烂的论点
伐，自然，
其志在吸毒
与此同

母的永远
心中隐
敢多提一
点，去叫

你和我这
利益的目
滥调，让
可悲的。
是这些陈
们一个个

〇年三月

不算是批評

一个人之所以会受到批评，正意味他的言行有足以引起批评的地方。

如果那仅仅还是在批评的话，应是属于好事，因为这批评是有所要求，至少这要求是善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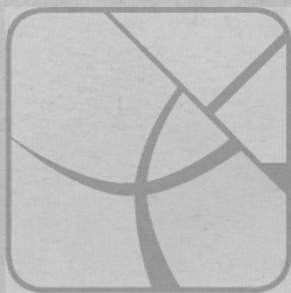
然而，今天却有不少人，还在以三十年前那种迂腐的论调散播给读者。虽则他们或也看到今天的时代，正沸腾着崭新的思想强音。青年人面对着这许多突进飞越的思想，他们为了获取新的思想意识，往往以激烈的行为来对旧势力和旧传统进行勇猛的反抗；许多所谓“权威人士”对这种反抗行为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提出了一种自慰的論調，认为这是“思想过剩”，青年人以愤怒的行动作为革命的要求。

既是今天有着许多不同的思想形态，“权威人士”还嫌“过剩”的同时，我们这里的文人或作家，还在贱卖几十年前甚至几千年前那种发霉的思想观念，有位作者还大谈志与道殊途同归，志即道也，继而又论人生目的唯求名和利也，这种近乎腐烂的论点，只有害于读者，不仅会受到批评，还会受到攻伐，自然，人各有志，但要看其志者对社会人群是否有益，如其志在吸毒，便以文言其吸毒之志，如此之志，不正是该死！

与此同时，最近还出现了一种愚蠢的肤浅的讥论，有位作

家者竟对马华文艺界前期作者作着近乎诬蔑的论说，其论说肯定当时马华作者的思想对当地政府的“效忠”而尽力，虽然也同时对人民效忠而尽力，这未免成了既是奴才文人，又是虚伪的“人民作家”，殖民地统治时代的马华文艺的历史，绝不是这类文人所能掩饰，昭南时代的血腥屠杀，也绝不是这些文人所能隐瞒，谁愿意效忠掠夺人民的财富的殖民地政府？谁愿意效忠那手刃万千生灵的日本强盗？只有叛徒，只有汉奸！

七〇年四月



我们平常对
也总无动于衷，
的目的是要购买
起他们的注意，
的产品能广销起
这时候，不
学着名牌的姿态
牌的图案和色彩
常识的人来说，
这还是商业
然而，这不是怪
文章，或是自我
们的“商眼”里
最有”什么的之
书”的作者和名家
也便臧克家、艾
想自诩为“马来
“爱国诗人”自居
可怜的是在“最有

廣告和批評

我们平常对于那些用上千倍的夸张来吹嘘和宣传的广告，也总无动于衷，卖广告者也并不耽心自吹自擂的不当，其最大的目的是要购买者或还未购买者对他的广告产生印象，至少引起他们的注意，只要那广告确实成为名牌了，也就意味这名牌的产品能广销起来。

这时候，不管是牛奶或是香烟，或是肥皂粉什么的，竞相学着名牌的姿态出现，甚至以假乱真，企图混水摸鱼，仿效名牌的图案和色彩，使购买者误以为那是名牌。这对于那些缺乏常识的人来说，倒是有些作用的，他们就往往被假名牌所骗。

这还是商业上的“自由竞争”的花样，似乎并不是怪事。然而，这不是怪事却也在文坛上出现，有些人写些批评性质的文章，或是自我介绍式的文章，也要起了广告式的花招，在他们的“商眼”里也找到了以名家为牌子的“牌子”，因此在“最有”什么的之后，便把他介绍（其实也是推销）的所谓“好书”的作者和名家排在一起，并且还有可能居于其上，这时，也便臧克家、艾青、袁水柏、李商隐地拼在一起，更甚者还有想自诩为“马来亚的鲁迅”，“新加坡的甘地”，也当然还有“爱国诗人”自居者，（那“爱国”者也是顶有效用的广告。）可怜的是在“最有”的千倍形容之后，我倒为那位“最有先生

”捏了一把冷汗，因为照他所说，除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表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之“最最”的“文学形式表现”可驾凌其上，这一广告招式用在文艺批评上却也真是“绝无仅有”的了。

由此看来，文坛上也的确很有“广告风格”，那些喜欢写点批评的——为了那出新书的作者——有时还得“硬着头皮”来写几行的，这也似乎有不得已的苦衷，因此在他们笔下的作者除了具有名家之“特性”外，便用上了脑子里所能想到的形容词，于是，什么“才华四溢”啦、“天才作家”啦，甚而是“生活的写照”什么的，这跟那些自吹为“爱国诗人”或自传式的作者的“自我评价”仍是同一基调的“广告腔”。

而我们这些读者，也因学识浅薄，在阅读了这广告式的批评和自我介绍的文章之后，倒也有几分相信那些作者的天才，及至后来看到另一些不是广告式的批评，然后或也真的因“广告的宣传”所起的效用而买下那些“天才”们的作品，读了之后也才稍为感到那广告太不中用了，不幸的是，名家却成了商业性的名牌。

文艺一和商业利益或个人利益拉在一起，那文艺作品或“文学形式表现”永远也难成为如作家们津津乐道和梦想的“世界名著”了，这对作家和诗人来说，不仅可惜，而且也该是很痛心的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

從「孟母教子」想起

小学时我们读过孟母教子的故事，那意思是孟母见孟子懒于向学，一气之下便把梭机上的丝线剪断，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叫孟子震惊，孟母便因此感动了孟子，而孟子从此以后便孜孜不倦地努力，以至成了“圣贤”人物。

小时候读到这样的故事，心里总很不服气，做母亲的虽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关于孟母教子这类故事却懂得很多，而且就一直以这些故事来激励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受到感动，反而厌恶起来，每当听到母亲对着我们重复又重复这类故事，我就很不耐烦。

到了今天，我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了，重新温习一下这些“圣人”的成功史，我发现了一种奴性的封建意识，所谓孟母教子，朱买臣、苏秦、张良等人的伟大，引起了我许多疑惑，我总觉得这些人物并不可爱，倒是很自私。

几千年来，这些忠君而自私的人物，被当成典范来教育我们，幸好我并不崇拜这些弱不禁风的圣人，倒是更喜欢水浒传里那些叛逆的英雄人物，因此没受到什么感动。然而，这些人物一直被歌颂、传扬，或多或少仍受到影响，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念，和这些人物的影响不无关系。

就说孟母教子吧，孟母以那种消极的绝望的机会主义的方

法来感动孟子，孟子毕竟是无知，小小的心灵或也受到严重的刺激，这一刺激使他后来成了封建帝王的高级奴才了。再说，象孟母那样的威胁手法，今天也是常见，有些人甚至一气之下登报脱离父子或母子关系，这已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至于摔破碗啦，摔坏东西啦，这种任性的不满的极端行为，正是孟母余风，可就没有孟母那么幸运，把孩子教育起来，成了圣贤和大官。

同样的，也有许多青年学子，要学朱买臣、苏秦和张良，也因为如此，读书读得脸黄肌瘦，而且成了胆小的自私鬼，自然，当中不无受到文天祥和岳飞的影响的，及至真的要他们做文天祥和岳飞时，却大都变成了吴三桂。

这使我想起，读古书未必所学都有用，而往往成了书呆子，成了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看到一代新人，他们可能不曾读过孟母教子之类的古书，但他们却叫高山低头，大海让路，他们不仅开辟了新天地，还出现无数的英雄人物，而那些圣贤人物奋斗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陈旧不堪，于他们反而是害多于益了。

因此，书不是不要读，然而“毒书”是很危险的，几千年来，就不知毒害了多少人的灵魂。

一九七〇年五月

生存問題

此时此地要谈生存问题，或会被人嗤之以鼻，因为据说我们的生活水准，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换句话说，我们还不至于要象印度或印尼那样出现饿殍的悲惨处境，而我们的人民平均收入都还相当过得去，至少我们不必担心会有饿死人。

我或者是神经过敏，杞人忧天，当中国的物品减少进入港星两地消息传出之后，我自觉袋子里的一元票额似乎又要买不到更多东西了，及至中国人造卫星在天空中叮叮咚咚地高奏国歌之际，美国人民因尼逊总统挥军侵柬所受到的耻辱而群起示威抗议之后，毛泽东主席一鸣惊人的声明之后，整个“自由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的更惨重的“大地震”，这几天来，“自由世界”的股票市场猛然惨跌，又不知有多少的亡命之徒般的资本家走进自杀电梯里升天堂去了，這使我想起了生存问题。

那些惯说漂亮话的先生们，终日饱食三餐，一个午餐的豪饮，抵得上我们用几万斤力气、劳碌一个月后所得的薪水，对于生存问题這在他们似乎不成问题，然而芸芸众生中，劳苦民众当是最大多数，我這位忧生的小民，虽没有因口渴时饮了百事可乐而能万事如意，样样第一，也仍是劳劳碌碌的一份子，“自由世界”的经济危机所出现的大地震，将会震动我们的生活吧？這一震，生活将又有什么变化呢？可想而知，将是更多

人叹“搵食难”了。

事实是，有那么多人需要工作，就证明生存是严重的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着的问题，而这问题在目前的处境益显得严重。然而，尽管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里，许多缺乏自由的生存条件却使千万的民众更觉“搵食难”了，洲与洲之间，国与国之间，甚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限制，变成了一种压迫，可悲的是，联合国通常发出的报告都再三警告人民——人类的粮食不足，因此，比亚法拉一场内战，每天就有千万人饿死，两个“印国”人民常有饿殍，假如第三次大战爆发——但愿不会发生——星岛人民真个前面是海，后面是海，可就不知何处去了。

“生存”这两个字眼就特别的庞大了，那些无“国民”身份的人，连想去长堤那方向亲戚讨蕃薯吃的机会也成问题了。到了这样的时候，我想是没有人会把蕃薯送上门的吧？

一九七〇年五月

被送去的事

于长城和于长庚两兄弟被送去“自由的台湾”去不自由起来之后，也确实引起了许多许多人的愤慨。我这里还只是说被“送”去的，但所有的报导却没有这般客气，都说他是被绑架去的。

不管是“送”去的也好，被绑架去的也好，反正都是去了不可自由的地方。想当年张学良还是请命被送去南京的，那一送就送到今天，“西安事变”的主角，还不是被送个不自由的“自由”吗？当然，这被送的事倒并不新鲜，大凡那些象于长城和于长庚两兄弟这样被送去的人，也都是一言难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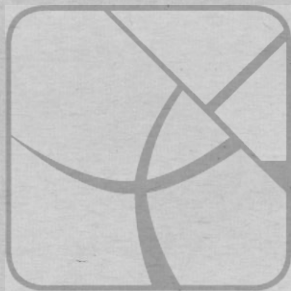
对于于氏兄弟的惨遭被送去的命运，美联社还称之为“亚洲阴谋史上最奇异的案件”，可见亚洲也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案件，否则就不可能有史可言了，美国人大概是很了解亚洲的阴谋史的，把于氏兄弟事件列为“最”，我想，今年世界大事里，此“最”当不可漏掉！

于氏兄弟也毕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是平平凡凡的菲律宾人，或可称为文化人，他们办报只是不学人胡扯礼义廉耻，他们并非什么革命领袖，因此，他们的被“送”走，人们很是不服气，这不服气有诉诸于言论的愤慨，当然也有菲律宾青年以行动来表示愤慨的。

能有愤慨的表示总是好的，因为总还表示了一点不是“软骨头”；不喜欢“软骨头”的先生们也应由此愤慨，可惜的是，那些只会高谈“软骨头”的先生们，内心的愤慨，不知愤去何处，慨去何方了。

于氏兄弟被送走之后，就勾起了我对被送去这样的事的莫大痛恨，因为我这不冷的血液，会有几分的激动，这激动使我在这里叫一声抗议，抗议这亚洲阴谋史上的阴谋。

一九七〇年六月



談良心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找到“良心”这观念，所谓“良心”，当是指“善良的心”，善的、好的感情，和这相反的，当然是“没良心”了。

大凡骂人“没良心”，是指那人缺乏好的表现，而那表现大抵是损人利己的作为。譬如“没良心”的人把妻子或爱人抛弃了，便称为“负心的人”。

但也有一种称善的，即是象日本侵略者在大砍大杀我们的人民的时候，当中一个死里逃生，而没有被刽子手杀掉，或者说放他逃生，这么一来，人们却在感恩之余称道：“他还有良心”。

到了这个时候，许多人口头上虽也大谈“良心”，但已经到了“良心”不值钱的地步了，一个人见死不救，当然会被人责之“没良心”，但不少逼得走投无路的凶手，却也不是“没良心”的诅咒就能把凶手消灭的，当我们看电影时，剥削成性的资本家教儿子要心狠手辣，那简直什么“良心”也没有了。

这时候对人谈良心，似乎是一种讽刺，因为许许多多的事，并不是良心的观念所能支配，柬埔寨龙诺集团屠杀千百手无寸铁的人民，美国大兵用各种武器、毒气杀害数以万计的越南人民，但却是在为了“保卫亚洲和平”的“良心”下干的，

美莱村大屠杀所显现的“良心”就不只是“没”了，而且是狠毒到了极点，而美国最高当局的“良心”，一直在驱使千百万的美国青年去送死，这“良心”的确是很没价值的了。

但为什么人们还要学我们的祖先讲究良心呢？我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道理还不错，因为至少对于敌人来说，这是必要的。

我们何必在抽象的“良心”观念下打转，只有好人才会想到良心，好人遇上了坏人，他的“良心”也会被吃掉。

我们这社会，有几颗“良心”？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一九七〇年六月

好人難做

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谁也不敢想象将来会成为什么人，因为做小孩子的，还只是学做人的开始。

既然是在学做人，也就什么都要接受，先是接受父母亲或祖父母的教诲，我们这些中国血统的，最先是学长辈们敬重祖先，敬重鬼神，因此，当孩童还不会学话时，已先懂得向祖先的灵位“呀呀拜”了，到了会走会跳时，也跟着祭拜鬼神，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先就被鬼神所统治，倘是要反叛这坚固的传统信念，将有很长的一个时期进行反叛活动，作父母的当然不满儿女们这一反叛的表现，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敢于反叛这传统信念的儿女，思想多少有了方向。

然而，大部分的，还只是跟着父母亲的老传统去做，当然，他们做人的方法也是如此，虽然其中不无矛盾的冲突，因为学做人的年轻一代，受着这时代变化的影响，受着社会变化的影响，自然也受到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原先，许多人也只想到要做好人，要做好事，要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贡献出力量，这该是理所当然的事。

做好人原是在学做人的时候就想到的，但是当达到了青年阶段，似乎好人先没做成，就变作坏人了，当然，他们原先并不想做坏人，然而，周遭的环境却那么多坏人坏事，即使已经

是知书识礼了，却坏到无可救药。男的可能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流氓，恶棍；不那么坏的，也已是堕落得不成样了，甚么坏事都似乎可以干。至于女的，虽然打杀的事她们很少出场，然而乱爱，滥交，和那些男的在一起就为非作歹了，飞男飞女就是这么产生，这些青年男女是做人人都还没做成，便在人生的半路上垮掉了。

日前有七大盗的相片登于报上，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我想，他们在小时候也不曾想到将来要做大盗的，可是现在却成了“见到就抓”的大盗，他们当中或也曾读过书，而且还有读到高中毕业的，也懂得为国、为民的大道理，如今好人做不成，却变成了大盗人物，到了这地步，大概连做好人都不可以了，这样的青年人该是很可悲的了。

其实，在一个充满坏人的社会里，坏人似乎很难变成好人，相反地，倒是好人要变成坏人容易。虽然有许多人看来并不是坏人，但他们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又有谁知道呢？而我们只知道那有名有姓的七大盗，至于那些比七大盗还要罪恶的人，可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事。幸运的当然不必被通名道姓“见到就抓”，因此，即使没有七大盗这社会仍旧盗贼横行，罪恶累累，我们也只是在担心着太多的好人会变成坏人。

这便是好人难做，因为许多要做好人的人未必能做好人，有许多原因会使他变成坏人。这社会正产生许多坏人，要做好人就必须能有坚强的信念，抗拒一切有可能使他成为坏人的力量，这时候，能成为好人者该是很贵重的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

不算是怒

我看，这个时候许多可见的事，都并不是可足以“欢笑”的，虽然这时候我们也还“有幸”能看到有花有月的良宵，还有以胡闹来骗取生活的所谓“笑剧”，但所能看到的还是太多不能“欢乐”的事。

不仅是那些带着不满的鲁迅式的愤慨在文坛上抒发，绝大部分的文字也还是满腹怨恨，即使是那些歌斯底理的流行歌，也缺乏可以欢乐的情调，可悲的是这些音调却是灰冷哀伤的，因此，整个社会也就是一片灰暗，混杂在这阴暗里是哀、怨、恨、怒。

还好的是，也还有怒的勇敢，怒的挑战。因此，终于在哀、怨、恨之中，看到怒的力量，而大花脸之流的正人君子的假慈悲的诗文和理论，在此时也便显露出它们的卑贱和可怜了。

当我在看“屋”这影片时，我强制地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这激动倒并不是天堂里的“欢乐”所能感动我的，而是一种悲哀的感动，那些从来就被人践踏的劳动人民，不是被人当为取悦外国人的角色，便是被权贵们用来做榨取财富的生产工具——人类可悲的奴隶，我深深地领受了“这叫作剥削”这句话的愤慨。

这时候，我们就更鄙视于那类污辱或歪曲劳动人民的正直

面孔的言论和文章，这时候，更多的怨、恨、怒的声音就越使我觉得这人间的确缺乏“欢乐”，原来一直用“天堂”来哄骗世人的“自由世界”的上帝是多么可恶。

这些都是早已有的鄙视，只是现在就更加的鄙视吧了。当看到学生们带着无知的冷淡遵命于老师们所定的大块头论文的作文时，我真为这些可怜的学生们担心，因为他们也的确在没有可以激起他们感情的思潮下写了那些叫他们畏手畏脚的大题文章，而这时，他们大概更乐于写些象在公共厕所和电梯里能见到的“愤怒”，呜呼！这社会，“天才”也会软脚而至垮掉。



一九七〇年六月

有和無

假如我们的社会，有人因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而发疯、自杀，在报纸上也只算是平常的新闻，这新闻也并不怎么令人注意，因为这是“自由世界”不均、不足的基本特色，然而，“自由世界”的宣传家和造谣家最会吹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小弱点，倘是社会主义国家内有人逃亡、有人自杀、有人饿死，那可要象阿波罗号登月球那般，大做文章了。

自然，宣传家和造谣家从来不会告诉人，有多少人从“自由世界”逃亡出去，他们日以继夜地盼望有象影星高远这样的叛徒，投进“自由世界”的怀抱里¹自由起来，而也有宣传文章和造谣广播的丰富材料。

不幸得很，“自由世界”里的人民，除了那些要造反或在造反的“暴徒”之外，大部分的人民还只是在水深火热中求生。

因此，一个箱头垫上一块木板，上面放几块猪肝、或是一板豆腐、或是几斤生菜、或是几十粒鸡蛋，当然，那价值不到十块钱的物品，在大老板的眼中，可不够他们进夜总会喝一杯“白兰地”的，然而，在这些小贩们的眼中，却是带着生存的意志，带着赚取生活的希望，虽则，他们拖欠了两三个月的“礼申”费，也还得忍受而赚取三五角或一两块钱的钱，这钱是

实在的钱，每分每角都有着为生的重量，这重量却又很快地被“十二支”、“万字票”的引力吸了去。

人们再也不那么小布尔乔亚地问“为什么”了，因为问了为什么总是涌出更多的为什么，但都会知道，或至少意识到这里的的不平的丑恶，意识到无者更无，有者更有，无者当然会想发大财，中头奖“多多”，中“万字”，但更多的还只希望用两角半或一个“半张”来获取一点“奖金”以填补不足。

有者，因为有更会有机会，象美国佬不惜千里迢迢派千万军队进印支三邦，除了保卫“自由世界”的“和平”之外，还可占有军事上的地盘，其中获取的利润非外人所知，犹如打广告花大钱，何足奇。但占有和掠夺总是分不开的，因此伸出巨掌，可占的就占，最好能独霸天下，唯我独尊。因此，世间有那么多用几块钱的物品分别挤在小巷、路边、陋屋里寻求生存的人，也有那么多的人张开血口，寻找吞吃的对象，这便是“自由竞争”，那“自由”永远不会在穷困的人那一边，这自由已经被别人占有了。

一九七〇年七月

失去了價值的人

这世界是有许多“论”的，尤其是专家学者，或是自由派的文人们，是很重视人权的，也因此有了所谓“人权论”，宗教家们则更天真地宣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专家学者们著书立说，呼吁人类要尊重人权，自由派文人，更要求自由和解放，联合国也堂堂正正有了“人权委员会”，而且还有“人权日”。总之，这世界，好象都在尊重人权，重视人权，换句话说，人们在重视人的价值。

我们不是“论说家”，也不是专家学者，也就遑论人权了，只是因为我们眼睛可以看，不幸得很，总还是能看到“血淋淋”的现实。越南人民，尤其是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人民，一被捕了去，就似乎不是人了，因此“虎监”似乎也并不新奇，我们经常可从美联社或合众社发表的相片中，看到裸脚赤膊的“越共”被蒙住眼睛，个个手脚都绑着，然后一行行地连在一起，在枪尖下踉跄行走，也曾看过女“越共”被囚在兽笼里，也有的“越共”被按在河里。总之，比“虎豹别墅”里见到的九层地狱的刑法更新鲜，如今，发现了“虎监”，那该不是奇怪的了。

不过，人权这名堂也顶好听的，当人被当成兽般虐待时，人已不如兽了，因为兽还只是被人养而已，甚且还为主人所喜

欢，只是不自由吧了，倘是有人敢明目张胆虐待动物，还会遭到“爱护动物协会”的抗议。至于人呢？在不见天日的牢笼里，爱管的人也未必管得了，人权论虽是动听，也救不了不如兽的人。

至于那些浮在湄公河上的尸体，似乎和死鸡一样，只是让河水冲着走；在村庄里，在田野上被射杀的人民，横尸累累，那价值就更没有了。

人一旦被当成兽时，人再也不是人了，这便是人类的耻辱，人类的悲哀，专家学者们的人权论，又值几斤几两呢？



一九七〇年七月

談控訴

能有控訴是好事，因為控訴所揭發出來的黑暗，讓人知道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的生活，有著令人不可忘卻的仇恨。

其實，我們這時候不只能看到帶著憤怒的控訴，同時，也能看到為偉大的事業，偉大的成就所激起的歌頌，這歌頌當然不是那些用偷抄的方式所寫成的“頌歌”，然而，更多的是控訴。

那血碑所刻下的仇恨，儘管已是二十多年的事，仍舊不能遺忘，虽说那高聳的擎天柱還缺乏英雄的气概，然而，骨鏹里的骨灰仍是仇恨的铁证。

這還是二十年前的苦難。

二十年後，仍舊有寫不完的控訴，這控訴來自活坟墓般的礦場，來自苦難的膠林，來自伐木工人的血花四濺，來自漁民們在鐵算盤累積成的高利貸的苦日子中，來自三餐不飽的農民，來自工資低得令人咬牙切齒的大工廠，來自建築工場飄起的口號中，來自終年被欺凌的梨園工人，來自小販們被驅趕的憤怒中，來自無數的窮困者和失業者，來自沒有國籍的被遺棄的“公民”們，來自廣大的勞苦大眾。

這些人都在控訴，都需要控訴。

因此，当自杀了之后，也会留下控诉的遗书，有的还大骂外来的资本家，控诉出女工们受到的欺凌，更多的是，大众呼声，读者之声，那里发出的怒吼，可谓是抹不去的，血淋淋的事实。

这便是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曾因“迷你的蓬勃”所激起的繁荣而能不控诉。因为那繁荣并没有使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改变，相反的，是越来越多的，使他们自觉难以活下去的痛苦。

这痛苦也终于由控诉中揭发出来。

我们，也终于看到那些控诉者的觉醒，这觉醒也绝不是“迷你的蓬勃”所能掩盖的。因此，我们也经常在看这些控诉的文章，看这些控诉者的愤怒。

一九七〇年八月

地獄里的「開明」

我们原先是很受孔孟之道所熏陶的，虽然，“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我们这里“孔家店”的生意仍“大展鸿图”，虽则，今天“之乎者也”并不甚合用，孔孟的忠君和孝道仍大行其道。

孔孟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主要是不可反对君王和双亲，由此，被奴役的顺民们，即使是极端不满君王和家长的独裁专横，也只能忍气吞声，那些不事劳动的士大夫阶级，这时或也会以民主的英雄自居，舞文弄墨，“谏书”、“上书”便由此而来，不外写几行“深望开恩”，“深明大义”等八股文。倘若那些昏君在饱食玩乐之余，忽开金口“准爱卿所请”，这些驴子般的“卿们”便雀跃万分，佩服得五体投地，遂大作文章，歌颂“皇上”之开明。

人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一旦被那些专横的统治者以两面刀的手法玩弄一下，那些应声虫们便歌功颂德了。美军侵略越南，是在世人面前公开犯罪，照美国的法官先生们的判决，那罪刑不只监禁一千年，一万年也嫌太短。然而，当侵略者退而求次，搞个什么撤军计划，慢慢儿的撤它三五千军队，那些应声虫们，便大作文章，不仅欢迎“总统”的“开明措施”，还会啼泣淋漓地为“总统”的开恩而觉得“和平在望”。

这是一种侮辱，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因之，当那些被剥削、奴役的人民，在艰苦的斗争中夺回了一点生存权利的时候，忽然被人用权势加以摧毁，那当儿，自然引起舆论的谴责，那千万的人民的权利，一夜之间被人用口或一纸命令“吊销”了，自是惶惶恐恐，正在怒不可忍之时，“开明”的大人先生忽然来个“暂缓实施”，或是给予某些人享有某种“优待”，如此，那应声虫便又大作文章，说是“开明的措施”！

这“开明”的字眼可就令人不解，仿佛人民只能生活在地狱里，要等阎罗王开放点“光明”才见到阳光，人民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如今，“光明”被关禁起来了，一旦被“贤明”的总统什么的开放一点便“欢呼”声四起；可怜的是，人民从来就缺少这种欢呼的热情。因此，虽则美军也三五千的撤出越南，报章、杂志、电台、电视台如报导皇上的圣诞节目，终日报个不停，而越南人民只知道要解放祖国，就必需把侵略者赶出去，因为那罪恶绝不是“开明”的颂歌所能掩盖的。

一九七〇年八月

「危險」之談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听说十七岁是危险的年龄，据那些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们的看法，十七岁的年纪正是“血气方刚”的时期，这正对上了“狼虎之年”；这些“家”们的伟大，立足观点当然是在那所谓“性”的觉醒这基础上，“宝岛”的“天才剧作家”或“小说家们”，也便有了“寂寞的十七岁”和“春潮”这类傑作的生产。

以年龄的成长期来突出所谓危险，那其实是自欺欺人，是在为这罪恶的社会洗罪，在罪恶的、腐化的社会里，任何人的生存都具有危险性，即使是老弱的佝偻的人，虽不在“性的觉醒”的十七岁阶段或在“性的饥渴”的所谓“狼虎之年”之期，在这社会里也很可能横尸街边，倘使要冠以危险的特别年期，我看称之“枉死之年”最为恰当，这些枉死者往往也只能一笔勾销地谓“与人无尤”，在“太平间”里让实习医生们作个实习报告，甚为方便。

但也有并非老而枉死的，日前有位做母亲的因儿子经过公路而遭路边的大树压死，竟聘请律师提出控诉，指说儿子之死实因缺乏安全保障所造成的，但因太多的“意外死亡”，“与人无尤”的事，这样的控诉似乎也并不甚令人注意，这位做母亲的，心中是想到了那死的意外是并不意外的，想到了如此不

幸的死是因为有着危险的因素存在，这危险之所以存在，是有人应负责的。

这又使我想起一件比十七岁和十七岁以上年龄更危险的事，那是三五岁的还缺乏“觉醒”的小孩，日前又再出现一段新闻，关于小孩在“高楼大厦”上摔下变得血肉模糊的惨状，这样的新闻本来也并不新鲜，不过，也还是新闻的内容，小孩之所以摔下，大概照社会学家或其他“家”们的解释总是“意外”的答案，主因当然是做父母者没有照顾，这和前面那位被大树压死的危险看来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很可以解释成“横祸”，至于后者，就有“做父母”的责任，因为父母外出买菜或带儿女上学，家中留着学爬学站的孩子。与这“做父母”的责任有关的，还有一种情形，即是这样的孩子弄翻了正在滚热的水壶而惨遭灼伤，这些都是常可见到的新闻。这一危险仍旧还是意外的论断。

看过了“中国万里行”，人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幼儿园里摺棉袄的孩童，那些跋涉千里的十七岁或十七岁左右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工厂里奋发图强，进行增产斗争的工人，那些在农田里忙着收割的老者，对于那些“家”们的伟大论断当可以翻个倒底，那真正的危险的根源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一九七〇年九月

「在下」的敬意

我们对于那些处理行政工作的“官先生”或“官小姐”们，都很要表示尊敬的，对于这些被称为“人民公仆”的人，尊敬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的人民是很懂得这种尊敬的礼貌的，因此不论在任何部门里，对于这些“官先生”或“官小姐”们都会以笑脸来表示敬意，虽然，这当中的笑脸未必都是“诚心诚意”的，然而，习惯性的、机械化的尊敬，在我们这社会里并不觉得虚伪，为了表示自己是“在下”的自谦，这虚伪也便成了习惯性的社会礼貌了。

然而，“官先生”或“官小姐”们，多半颇不屑于这敬意的表示，他们若是开心的话，做起事来倒还顺利，否则，因芝麻小事而弄得争论不休，那原先的表示敬意的笑脸也会一扫而空，在排队或在等待的人，就因着苦等已久而要再忍受“遇外风波”的拖延而苦不堪言。那些对人民从来就缺乏礼貌的先生小姐们，大概很受了大英帝国留下的行政作风的光荣传统的教养，在无可奈何之下，便只好杀出一招，叫人去向上峰“抗不灵”，当然是有人理直气壮地去申诉了，但更多的是跑到报章上发几声“读者之声”之类的申诉，那也是不得已的、忍无可忍的事。

为了表示敬意，人民只好对着那些傲慢的先生小姐们“嘻皮笑脸”几下，我看，多半的“嘻皮笑脸”的人是懂得避免麻烦的；有些时候，反而是那些做杂工的人更热心，他们也是“吃政府头路”的，可见，人性的丑恶很可以在许多场合中发现。

可怜的是那些无国的“公民”们，他们也算是世界上最有耐性的人，几年来仍旧不能越“国界”一步，在绝望之余，再也不愿去问那些先生小姐们，因为总是机械而无情的答复，虽然是闯过了好多次的不同地点的部门。那蓝色的“证”已成了自卑的标志，那些在民之上的“公仆”们，是不觉得这“蓝色的忧悒”的痛苦。



一九七〇年九月

清潔的後面

我们似乎听惯了别人的恭维，尤其是那些从「宝岛」或香港来的「水银灯下」的男士或女士们，从下飞机乘汽车到旅馆，还没来得及把高跟鞋踏在街路上，便对着观众们大赞这地方非常清洁，人情很好，「迷」们都很热情。

我看，这些或者就因为在那肮脏的地方住久了，看惯了周遭的冷漠的人，一到了我们这地方，虽然还没真的看到「清洁」，还没确定是「人情很好」，便忙着颂扬，那一半是在讨好，一半也为的是表示礼貌。倘是一「驻」经年，我看，这样的称道将是难再听到了。

我的记性不好，不过，我是还知道有过这样的「过客」，住在旅店中弄得几乎自杀死去，这个「过客」所遭遇到的冷淡，是「迷」们所不能援救的。

我还是来谈受人颂扬的「清洁」吧，从冷气设备的汽车里观望，我们这里也可真是很清洁的。不过也有不得已之处，譬如为了不让那农舍的简陋，混身污泥的猪群、破烂的高脚楼暴露在「过客」们的眼前，未知是那些伟大的专家想出了「遮天」的傑作，筑起坚固的围牆，而「过客」们只是从车窗里眺望，自是不觉风光不好；对于被围起来的穷人来说，那该是打从心底里的不敢佩服，甚至还有受辱之痛苦，然而，这可是为了

「需要」而设的呵！

但也有並不是围牆所能挡住的，我有几回就几乎踩中了孩子们撒下的粪，至于狗屎也並不少。我们的组屋是有光荣的体面的——虽然印度有人在其印度报上不屑于这光荣的体面，发了几声热嘲冷讽，对我们的穷人来说倒还可免掉一层火难的恐惧，不过，那些两行排列的算是房又是厅的「单房」组屋，走廊上的腥臭，到访者实在要觉得发呕，唯因「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习以为常不觉难耐了。尤以电梯里的尿味，可谓名闻全市的了，而闹市里的臭水沟，会叫「过客」们非用更多的香水来充盖不可。

这还是众人所知的几点，当听到明星和歌星们的赞声时，我並不因这讨好的恭维而高兴，倒是心底里满是不舒服，我们这些在「火山边沿」的人，虽不敢像富人们在絃歌中豪饮，却是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一切骯脏。

七〇年九月

「在手術台上」的大學生

我們好象已經把雲南園當成“樂園”了，好些年來，詩人和劇作家替“樂園”增添了不少浪漫蒂克的色彩，傾注了太多的愛情於雲南園的黃昏、相思樹的黃花綠葉里，劇作家筆下的迷你女郎（对不起，是梳太空頭，穿迷你裙的女大學生），在南大湖的月色下慷慨激昂地向愛人灌輸“愛國”大道理，因此，這“樂園”也便被描摹成一幅富有“優美生活”的畫。

現在，“樂園”里的大學生們却和詩人，劇作家們唱反調，這跟原來的浪漫蒂克情調很不調和，譬如那“在手術台上”的座談會，就有許多精彩的妙語，從大學生們“沒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思想”，到“輔導處的產生在南大來說是一種恥辱”，進而“職業學生”以及不甚可耐的“政治恐懼病”，又而是“中文大學”將變成“英文大學”的另一種悲哀的恐懼，恐懼中忽然穿插了沒有結論的男女同學的關係，笑聲中道出了校警調戲女生的多情舉動，旁觀者倒忽然亮了眼，難怪大學生們厭膩了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圍牆哲學，雖然在死啃發霉的教授筆記，在醉心於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桃A之余，還會覺得“無聲”的悲哀。

在徬徨於“到自由或奴役之路”的同時，終於追忆起“昔日風采”，先輩們“轰轰烈烈的干了一番事業”的可敬，在一

部分“关心南大的同学”敏感的嗅觉下活动，很感到处在“被怀疑的地位”的可悲，现在是到了“不甘寂寞”的时候了，大学生们今天身处的悲哀，终于领悟了“耻”字的真谛。

这些犹如南大湖的涟漪般微动的声音，很叫我对诗人们描彩成的死画起了怀疑，记得当年的“英雄”在文学院礼堂高呼“南大湖要掀起千尺浪涛”之际，我也曾对南大有过满怀的信心，待到云南园变成“乐园”，校警在夜间或因不堪寂寞而偷摘同学们种植的黄瓜后，我似乎也和众人一样觉得云南园已经是“乐与乐”得可以了，也就只觉得那是一幅用汉朝或唐朝绘成的画，为了让高贵的客人能知道它是中国文明外流的遗产，用上英文去解说那画的存在吧了。毕竟是大学生们不愿“敢奴而不敢言”，才又使我追忆起“昔日的风彩”呵！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后 記

这本集子所收的廿多篇短文，还是和我的第一本集子“島上杂谈”同一种调子，也是“島上杂谈”的续集。

这些篇章原是发表在“民报”的一个栏上的，和“島上杂谈”一样，没有收录下小栏以外所写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島上杂谈”是一九六九年的笔痕，而这本集子里的篇什却是一九七〇年写下的。我定名为“港内杂话”，还是因为内容太杂，而且许多都是老调子，可以说是老调重弹。

现代的人类生活，尤其是政治性的内容，变化得令人难以抓摸，但並沒有越出变化的规律性；虽然如此，史家们的笔大概也是难以驾驭的，我这个文人所写的东西，就更加赶不上时代发展的进度了！因此，集子中的篇章，重读起来，颇有过时的痕迹。

这是随感而成的文字，无疑渗进了我个人当时的情绪，其中是含有悒闷的笔调的。我的看法必不会集中和正确，希望读者们指正。

陳 之

內 容 簡 介

這一本雜文集，收入作者于一九七〇年間寫下的廿多篇短文，也算是“島上雜談”的續集，作者在本書中繼續對社會上的各種不良風氣、文化制度以及人生百態，予以無情的揭露和鞭撻。



港 內 雜 話

出版者：長 屋 出 版 社
社 址：35, Jalan Belangkas,
Singapore, 13.
承 印：新馬出版印刷公司
代理處：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日 期：9. 1972

定 價：M \$ 0.50